



# 共舞影梦

与未来电影大师谈人文情怀

周毅  
陈青松  
◎主编



新华出版社



# 共舞影梦

与未来电影大师谈人文情怀

周毅  
陈青松  
◎主编



新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共舞影梦：与未来电影大师谈人文情怀 / 周毅, 陈青松主编.

-- 北京：新华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166-2173-8

I. ①共… II. ①周… ②陈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
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2445号

### 共舞影梦：与未来电影大师谈人文情怀

主 编：周 毅 陈青松

---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黄绪国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装帧设计：图鸦文化

---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---

照 排：图鸦文化

印 刷：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---

成品尺寸：160mm×230mm 1/16

印 张：19.5

字 数：25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11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2173-8

定 价：5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# 序言

本文集是北京电影学院首期人文大讲堂第一集，以培养未来电影大师为宗旨，学科交叉、不拘一格，畅谈人文教育，重塑正义理念，反思无学术大师的时代，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，鞭劈“失语症”，倡导撰写学术论文“博古通今、中西融贯”；重审“新闻学”，分析“文艺女青年”、“小清新”受众构成，计算影视院校人才培养成本，传播西方电影大师思想，揭示大数据的深远影响，凭借“信用”走向“靠谱”的“陌生人”；描述宏观经济新常态，强调环境公害的社会保障，提倡发展循环经济，建设美丽中国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提高治理能力。道明卓越者的成功得益于人文基础扎实，中国应试教育致使学生丧失基本的综合分析能力、逻辑思维和批判精神，是与西式教育的根本差距。大师讲的故事栩栩如生，引人入胜，其至理名言帮助我们确立人生航标，走向新岸。

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，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大讲堂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响应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号召，又好又快发展高等电影教育事业；“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换来凤城春色”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凝聚天下有志有才者，登高望远，脚踏实地，精心谋划，步步为营，借鸡生蛋，喧宾夺主，整合资源，公私合营，四通八达，左右逢源，献计献策，群策群力，理论与实际结合，科学与艺术交融，经济与文化协同，文理工交叉、嫁接和综合，政产学研商用一体，中西合璧，承上启下，传承创新；与北影其他院系及兄弟院校互通有无，

共同开发优质智力资源，建立一支能写、能说、能跑，全面发展的创新团队，推动教学、科研和创作并驾齐驱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丰富中国特色新型影视智库，引领北影人文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，促使通识教育、基础教育课程丰富多样，进一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，全面发展，跻身世界强校，实现电影强国梦。形势所迫，环境使然，全校共识，党委决策，人民期待。具体规划如下：

人文大讲堂规划每月开班1次，与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、北京舞蹈学院、中国戏曲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北京服装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，及其他社会资源联合共建，请大师讲座，师生互动，广泛吸纳广大师生参与人文大讲堂建设，学习大师，推荐大师，记录大师，传播大师。

每学期拟出版文集1集，期盼广大师生踊跃投稿，诗歌，散文，杂文、报告文学，传记文学，时政报告，各专业论文，以及学士、硕士和博士论文、博士后出站报告等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精品化，多样化，国际化。

同时，借人文大讲堂开奖和文集出版东风，创建名人传记中心，发挥北影品牌效应，类似哈佛和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；建立大师（院士）工作室，组成人文社会科学院专家委员会；招聘研究员，校内校外，海内海外，教师学生，不拘一格，学习巴金，自力更生，聘任为主，破终身制。开设影视经济学、影视传媒学、影视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课程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

曹顺庆

2015 年秋

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四川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）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第一部分 曹顺庆专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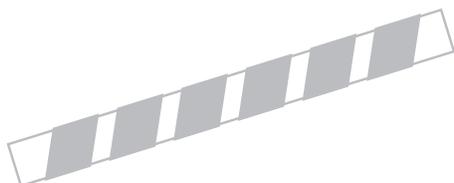
反思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	3
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失语症	11
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与文化软实力	21
纪念导师杨明照先生	36
为什么要读《十三经》	40
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	49
如何深化中外比较文论	62
博古通今，中西融贯	72
文化变异学：变异学学科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	75
曹顺庆先生如何培养比较文学博士生	87

## 第二部分 电影与人文

安德烈·巴赞电影的真实美学与文化人格精神	99
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	131
正义理念	139
解读莫言	165
中国大学国际化根本途径	171
阅读群体构成、知识来源及影响	178
研究型学习与撰写学术论文	189
影视院校人才培养成本	202
懂一点新闻学	209
走向陌生人	226

## 第三部分 经济与社会

当前宏观经济新常态	231
发展循环经济，建设美丽中国	245
大数据的影响	250
大数据对会计的影响	263
环境公害的社会保障	273
传承红色基因，提高治理能力	288



第一部分

# 曹顺庆专集

---

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，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，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，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；美国康乃尔大学、哈佛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；台湾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、淡江大学客座教授；比较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，比较文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。出版了《中西比较诗学》、《中外比较文论史》、《比较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化与文论》、《东方文论选》、《比较文学新开拓》、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》、《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》、《比较文学论》、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》、《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》、《比较文学学》、《比较文学教程》、《中华文化》等专著和编著 20 多部，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

---



## 反思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问题：为什么中国当代（1949年至今）几乎没有培养出堪称学术大师的一批杰出人才？

我曾在《文艺争鸣》1996年第2期中提出：“当今文艺理论研究，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文论失语症！”现在，我要在这里指出：当代中国文化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！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？这与“失语症”是相关联的，一个“失语”的时代，自然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；一个无学术大师的时代，必然是一个失语的时代。为什么会“失语”，这与我们的整个文化战略相关，尤其是与我们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。本文着重谈谈后一个问题。

“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（清朝赵翼《论诗》）在中国历史上，曾产生过无数的学术大师，他们与全世界学术大师一起，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，在夜空中星光闪耀，争奇斗丽：西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、伯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东边有中国的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孟子，有印度的蚁垤、龙树；西边是旦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，东边是屈原、马鸣、迦梨陀娑、李白、杜甫……即便到了近现代，即便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，在日本铁骑的烧杀掳掠中，在国共内战的隆隆炮火中，中国的学术界，仍然是人才辈出，大师云集。从王国维到鲁迅，

从钱钟书到季羨林，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性地产生出来的。例如，文学上的鲁（迅）郭（沫若）茅（盾）、巴（金）老（舍）曹（禺），学术研究上的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陈寅恪、范文澜，乃至自然科学上的三钱（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），我们还可以例举出一大批堪称学术大师的名家，限于篇幅，兹不赘述。

然而，近半个世纪来，中国在人才培养上，似乎停滞下来了，不但没有产生如司马迁、李白、李时珍那样可以傲视全球的大家，甚至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可与王国维、鲁迅等人相媲美的学术大师，虽然当前学术界也有公认的著名学者，但基本上不能与季羨林、钱钟书、王国维、鲁迅等大师级学者相比肩，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，成了一个“高山仰止”的神话，学者及广大青年学生们对钱钟书的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其实，有钱钟书这种学识的人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以大把大把地抓出来（如：林纾、严复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马建忠、熊十力、胡适、吴宓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若干学者）。诚然，钱钟书神话的形成，“钱学”（钱钟书研究）热的兴起，有着正面的意义，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：诺大一个中国，十几亿众生，当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，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，在近期内，几乎不可能再产生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了。更不用说产生如王国维、严复、鲁迅、郭沫若等一批泰斗级学者了。正如有人所说，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！中国究竟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断层？这是值得亿万炎黄子孙深刻反省的重大问题。中国要想真正强盛起来，恐怕必须直面这一严峻的问题。

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有人认为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不断的政治运动，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大整知识分子，大大伤害了学术元气；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口号中，自然只会产生不学无术的“白卷英雄”和投机取巧的小人。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。但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

经结束 30 余年了，从 1977 年开始上大学的人，如今至少是 45 岁左右了，从 1977 年上初中的人，如今也是 38 岁左右了，从 1977 年上小学的人，如今也 33 岁左右了。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，改革开放成就卓著。然而，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样呢？尽管我们培养了大批的大学生、研究生，但是学术大师几乎没有！有人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成长起来的人，他们还年青，但是，人才成长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几乎所有的大师，都是在年青的时候成名于世的。且不论世界级大师，仅举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几位近现代文学与学术大师：郭沫若 29 岁时（1921 年）出版了他的代表作《女神》，36 岁时写出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甲骨文字研究》；鲁迅 27 岁（1908 年）写出了《摩罗诗力说》，37 岁时发表《狂人日记》；梁启超 23 岁（1896 年）在上海主编《时务报》，发表《变法通议》，24 岁主讲长沙时务学堂；胡适 36 岁任北大教授，倡导文学改革。更有甚者，刘师培 36 岁即去世（1884—1920），年纪轻轻的刘师培，被时人公认为国学大师！回头看看今天，1977 年后入大学者，年纪小一点的多数已届中年，年纪大一点的有的已退休。大师何在？是这一代人不努力，不用功吗？绝对不是！看看今天中小学生读书的辛苦状，连多少父母亲都为之心痛；看看今天为考研而拼搏的大学生，就知道他们多么努力，多么用功！

造成这种“无大师时代”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，但其中至少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（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）问题。我们在整个教育体制、课程设置、教学内容、教材编写等等方面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导致了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严重失误。这种失误何在？我曾在《中国高等教育》（2000 年第 21 期）上发表过一篇题为“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”的文章，谈到我们今天大学课程设置的一些问题，现摘引数段如下：

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：多、空、旧、窄。

所谓“多”是课程设置太多，包括课程门数多，课时多，课程内容重复多。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，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、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，我们给学生开了那么多课，灌了许多东西，为什么没有培育出像钱钟书、季羨林这样的学者？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人不努力，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。课程越设越多，专业越分越窄，讲授越来越空，学生基础越来越差恐怕是原因之一。现在许多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元典，甚至不知《十三经》为何物，外语学了多少年，仍不能读懂外文原著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开不了口，李白的“浪漫主义”、杜甫的“现实主义”、几个“斯基”的理论学了一大堆，但离钱钟书、季羨林等大师的学术素养还差得很远，这样的教育机制如果继续下去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很不利的。

怎样解决课程设置太多及重复设置问题？我认为应当“消肿”。即适当减少课程门数、减少课时。可根据课程分类制定恰当的比例，要不然各门课都想扩张自己，想消肿也消不下去。有些课程可适当合并，如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课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课、文学概论课与马列主义文论课，甚至可考虑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合为一门“中国文学史”课程，便于压缩课程，贯通古今。本科课程设置还应当与研究生学科目录修订结合起来考虑，使课程设置具有连贯性和前瞻性。主干课程可大致考虑为7门：文学概论、古代汉语、中国古代元典导读、古代文学史、现当代文学史、语言学与现代汉语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。也可将现代汉语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结合起来设置。世界文学课应与比较文学相结合，将原开设的外国文学史改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，即在世界文学史的纵向论述中，增加各国文学的横向比较，以开阔学生眼界，增强鉴别能力。开设中国古代原典导读，对增强学生的国学基础，对于打通文史哲等人文学科，拓宽知识面，极有益处。

对于课程内容“空”（空洞）的问题，许多人颇有感触，认为我们现在的课程，大而化之的“概论”、“通论”太多，具体的“导读”较少，导致学生只看“论”，只读文学史，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就可以应付考试，以致空疏学风日盛，踏实作风渐衰。古汉语考试体系，连古典文学教师也适应不了，看得懂古籍的人反而考不及格，岂非怪事。针对这种“空洞”现象，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（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等）导读，减少文学史课时，教材搞简单一点，集中讲授，不要什么都讲。应倡导启发式教育，要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，读作品，规定学生必读书目，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（作品）情况，如抽问、抽查、课堂讨论、写读书报告等，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，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。

所谓“旧”，指课程内容陈旧。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，例如，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，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。以某高校为例，文学概论，还是以群主编的或25院校合编的，古代文学史用游国恩等主编的，外国文学用扬周翰主编的。新编教材近年虽出了不少，但似乎仍不足以取代这些老教材。陈旧教材、陈旧体系，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的不可避免的陈旧，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应积极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一批专家教授编写一批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要的高质量的新教材，并做好新教材的使用和推广工作。

所谓“窄”的问题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高校学科越分越细，专业越来越窄，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“匠”，却少了高水平的“大师”。现在，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，拓宽专业口径，加强素质教育，正在成为我国高教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。现在不是要不要拓宽专业口径的问题，而是怎样拓宽，如何掌握好博与专、学与用的问题。

我在这里要重点强调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元典阅读问题。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，他们大多具备非常厚实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。而我们今天的教育，既不博古，也不通今；既不通中，也不贯西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，不学西方的东西，而是学的方式不对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，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。什么是“走了样”的呢？因为今天的教育，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、主要内容、艺术特色之类“导读”，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。另外，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“古文今译”的方式来教学的，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元典文本，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。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。古文经过“今译”之后，已经走样变味，不复是文学元典了。仅以《诗经》为例，《诗经·关雎》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对这几句，余冠英先生译为“关雎鸟关关和唱，在河心小小洲上。好姑娘苗苗条条，哥儿想和她成双。”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工夫的，但无论怎样今译，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。还有译得更好玩的：“河里有块绿洲，水鸭勒轧朋友；阿姐身体一扭，阿哥跟在后头。”

试想，读这样的古文今译，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？能真正“博古”吗？能真正“学贯中西”吗？当然不可能！诚然，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，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，要真正“博古”，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，从原文去品味理解。我的老师杨明照先生，是当今公认的“龙学”（《文心雕龙》研究）泰斗。他研究了一辈子《文心雕龙》，但决不搞《文心雕龙》今译。曾有出版社多次约杨师明照先生搞《文心雕龙》今译本，并许以高稿酬，但先生坚决不干。在先生看来，《文心雕龙》不可译为现代汉语，因为一加今译，就走样了，会害人不浅。如今，我们终于认识到“古文今译”之害（弊端）了。甚至有人提出，古文今译而古文亡，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，就是中国文化危机

之日。其实，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，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“失语症”。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，必然会失语。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！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，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，但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？他们却并不真正懂，这是很糟的事情。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，但你要首先了解它，知晓它，否则你从何批判呢？可是，当今的中青年学者，大多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“十三经”，读过“诸子集成”，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弥漫学界的空疏学风之下，能产生真正“博古通今”、“学贯中西”的大师吗？当然不可能！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，“博古”做不好，就不可能真正“通今”。但我们是否在“贯西”上做得好一点呢？看看学界这些年的现状，情况同样不乐观。

“全盘西化”曾是时髦的口号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只要不是“全盘”，我也赞成“西化”。在我看来，当今中国学术界、教育界，不但“博古”不够，而且“西化”也不够，准确地说是很不够！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详观学界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，甚至是三手货、四手货。不少人外语没过关，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，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。以致有一些专攻西方学术的人，完全不懂西文，居然也可以当上外国文学教授、西方历史学、哲学教授等等。据传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有一次外国文学在某市召开全国学术会议，数名外国文学学者在某风景区考察时碰上外国人以英语问路，七、八位外国文学教师竟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位可以用英文回答！这种学术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，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一些中文系外国文学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，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，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文原文，因为如果完全不读原文，一定会出问题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本厚本的以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、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

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呢？

这种不读原文（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）的错，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，直接的恶果，就是空疏学风日盛，害了大批青年学生，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，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，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。

正是基于以上考虑，近年来，我大力倡导用古文（不用今译）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，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。自1995年起，我在研究生中开设了“中国文化原典：《十三经》”课程，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，教材直接用阮元主持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不用今译今注本。开始同学们都读得很艰难，但咬牙坚持下来，一年后古文及中国文化修养皆大为提高，基本能够自己查阅古代典籍，学术功底大大加强，不少研究生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后，才真正尝到了原典阅读的甜头。我还开设了“中国古代文论”课程，要求同学们背诵《文心雕龙》（起码背十篇）、《文赋》等中国文论典籍，同学们开始皆感到“苦不堪言”，但在我严格要求下，每个学生都必须过此关，结果效果非常好，无论是写文章，还是开会发言，同学们对中国文论典籍信手拈来，文采斐然。为了加强“西化”，从1998年开始，我直接用英文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“文学研究方法论：当代西方文论导读”，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。经过一番艰苦磨炼，同学们感到虽然太苦，但收获良多。我的用心，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，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，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，而不是大讲空论，凌空蹈虚。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，而是让同学跳下水去学游泳，教师只是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。